

中国
政治
文明
发展
与
建
设
丛
书

理性国家的成长

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研究



林尚立/主编

刘 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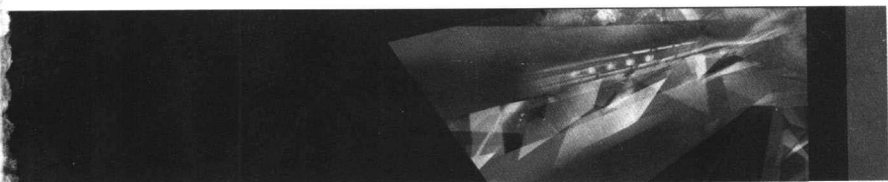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中国政治文明
发展
与
建设
丛
书

理性国家的 成长

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研究



林尚立/主编

刘 晔/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国家的成长: 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研究/刘晔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8
(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丛书/林尚立 主编)
ISBN 7-5366-7298-5
I.理… II.刘… III.国家—行政管理—研究—
—中国 IV.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844 号

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丛书
LIXING GUOJIA DE CHENGZHANG
理性国家的成长
ZHONGGUO GONGGONG QUANLI LIXINGHUA YANJIU
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研究
刘 晔 著

责任编辑 郑 玲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80 千 插页 2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7298-5/D·388
定价: 15.00 元

总 序

理想与现实,是决定人类生活的两极,人类生活无时无刻不摇摆其中。人类生活是多方面的,包含着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对来说,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是现实的力量,而主导精神生活的则是理想的力量。政治生活要特别些,同时受到现实的力量和理想的力量主导。这与政治生活的特性密切相关。

政治生活的本质,就是人们基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共同所营造的公共权力,来保障自身的权利和维护社会的秩序,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发展。所以,政治生活具有相当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受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决定;另一方面又主动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亚里斯多德断定: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不过政治生活,不是神就是鬼。换句话讲,对人来说,政治生活是人现实存在的必然前提。政治生活的双重性,决定了政治生活,不仅要受到现实力量的主导,而且要受到理想力量的主导,因为,政治反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功能,使得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政治之上,期待通过改变政治生活,提高政治的水平,来促进现实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当然,除此之外,人们对权利的珍惜以及对权力的关注,也使得人们对政治天然抱有期待,即希望政治能够有效地保障或实现自身的权利要求,或能够亲身介入政治,直接掌握或分享权力。这种希望和期待的最基本取向,就是民主的追求。

任何政治生活都必然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发展与变化,人类的政治文明正是在这种发展中得以形成、丰富和延续的。所谓政治文

明,就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力量,一方面来自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也来自人们对政治发展的希望和期待。在这两面力量作用下,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发展,首先都必须立足现实,其次要超越现实。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无数经验表明,有效的政治发展,都应该是立足现实与超越现实的有机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二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包括政治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

近代以来,基于市场、资本和技术的力量而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把各国的发展日益纳入到全球发展的运动轨道。在这种发展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于是,追求这种“未来的景象”就成为不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在政治发展中,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未来的景象”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于是,民主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然而,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在尚未找到通向民主化发展道路之前,民主化必然更多地作为理想的力量作用于现实的政治发展。伴随这种作用的往往是西方政治的制度、价值的绝对化,从而使这些国家因此将其简单地照搬照套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无数的经验事实证明,这种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不难,但是要取得成功很难,因为,要使外来的制度和价值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本身就非易事,更何况这种照搬照套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带来种种后遗症。于是,在追求民主化发展过程中,如何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实践有自己特色、符合具体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不发达国家民主化发展的关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06页。

中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发展始于近代。当中国力图通过变法来振兴国家的时候,建立现代民主就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追求。这种追求的首先体现就是引入西方的制度,定宪法,开议会,搞选举。然而,辛亥革命前后的所有努力,不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都没有使这些制度在中国真正扎根,并解救中国。但是,辛亥革命所留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遗产,使中国真正走向了民主共和的道路,其最大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在相当长时间里照搬苏联的模式,没有有效地处理好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果,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和实践遇到挫折,受到破坏,并因此导致“文革”。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以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人民民主和建立法制、推行法治为目标的新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在总体上是成功了,它不仅有效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而且有效保障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由于时代、国情以及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原因,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相互促进,稳定发展的时间不多,最集中的体现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全面变革与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有序而稳定的政治是任何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显然,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而且也是中国通过政治的有效作用来保障与推进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发展。只有同时看到这两方面的政治发展,人们才能深刻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建设 with 政治发展。

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追求的基本目标。这个目标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理想性。理想性体现

为它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寄托着民众与社会的无限期望;现实性体现为它在中国要成为现实,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而且需要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中国政治的具体发展来说,这个基本目标的理想性和现实性都直接转化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压力:目标的理想性,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快速推进;而目标的现实性,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于是,如何平衡政治发展的这两个内在取向,就成为有效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这种平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战略框架,它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层面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者协调发展;第二层面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有机统一;第三层面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三者有机统一。在这个平衡框架下,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推行法治以深化民主;变革体制以巩固制度;增量改革以保持活力;扩大协商以增强整合的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这种渐进的政治发展,在积极追求民主化的理想与目标的同时,时刻把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有效空间与根本动力,从而使自身的发展不仅能够沿着理想的目标前进,而且能够有效地保障与推进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及其成果的实际成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有序和持续的政治发展,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成长。所以,当人们力图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从中国政治渐进发展的逻辑去理解和分析中国发展的成就。

然而,中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并没有导致中国政治的保守性,相反,渐进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更为有效的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激发了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决心和动力,为此,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发展目标。建设政治文明这一目标与任务的提出,全面提升了中国政治发展,使

其在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机互动中,更加理性、开放和包容,进而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带入到人类政治文明的殿堂。

和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没有摆脱理想力量 and 现实力量的交互作用,但是,中国政治发展在经历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摇摆之后,最终还是找到了能够有效平衡理想与现实两大力量作用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目标:即以渐进有效的政治发展,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足以证明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显然,这种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其中自然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宏观的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的逻辑出发;中观的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从现实的逻辑出发;而微观的研究,则可能更多的是从对象的逻辑出发。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要对这个历史环节的运动规律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这个历史环节在整个现代化历史运动中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从中观层面研究更为合适。这种认识构成了本丛书选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决定了本丛书的总体风格:即不直接从政治发展本身的逻辑入手,而是从政治发展重要因素的现实考察入手,通过这些要素的研究来学术性地展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文明建设实践。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使命和运动规律,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使命,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这套丛书的学术努力,不仅有现实的关怀,还有学术的关怀。尽管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这种关怀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的这种关怀能够给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带来一些新的理论和学术元素,那么我们的努力也就有了自己的意义。

林尚立

目录

总 序	(1)
第一章 现代国家的建立: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发生	(1)
一、废科举:理性化权力的起点	(1)
二、以权力结构理性化为趋向的宪政改革及其失败	(14)
三、现代国家:理性化权力的发生	(23)
第二章 党政关系的调整: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发展	(43)
一、以党代政模式的确立:以共产党为轴心的公共权力 新格局(1949—1978)	(43)
二、以党代政模式的改革:公共权力结构的 调整(1978—)	(52)
三、理性国家的发展方向	(66)
第三章 官僚制:公共权力理性化的传统因素	(73)
一、传统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	(73)
二、传统官僚政治的基本架构	(80)
三、传统官僚制的现代影响	(93)
第四章 全球化: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外部环境	(99)
一、全球化:中国的缺席与在场	(99)
二、改革政府: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的 对策	(109)
三、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基本走向	(118)

第五章 市场化: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内在要求	(125)
一、公共权力理性化: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定位	(125)
二、有限政府: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	(137)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共权力理性化:从发展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147)
第六章 理性执政:公共权力理性化与现代政党	(153)
一、公共权力的理性化:党的执政要求	(153)
二、制度化: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理性模式	(160)
三、合法化: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执政党的政治贡献	(166)
第七章 有效治理:公共权力理性化与社会发展	(175)
一、有效治理:公共权力理性化与超大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77)
二、制度与人:理性化权力的结构要素	(186)
三、合作治理:理性化权力的运作形态	(195)

第一章

现代国家的建立: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发生

一、废科举:理性化权力的起点

对中国公共权力理性化问题的研究,首先要回答的是:理性国家生长的基点在哪里?飓风起于浮萍之末,百年前(1905年),晚清政府采取的一项在当时看来意义极其有限的改革措施——废除科举制度,极有可能是理性权力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得以展现和存续的标志性事件。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以科举制度为勾连的建立在传统国家、社会、文化一体化基础之上的政治体系是成熟而理性的。然而这一政治体系的存在,却构成现代理性化权力结构与机制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的制约。从公共权力理性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而言,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传统国家、社会与文化体系的崩溃,也许是理性化权力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恰当前提。

(一)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降特别是北宋以来传统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途径,开科取士一直被历代王朝视为关乎国运兴衰的大事。洪武三年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以后,科举制渐趋保守、僵化与腐败,在明清之际遭到顾炎武、魏禧等人的强烈批评,康熙初年索尼、鳌

拜辅政时曾一度取消了八股取士(1663—1668)^①。乾隆时,兵部侍郎舒赫德奏请改科举、废八股^②,道光初年,龚自珍、潘德舆等也提出了废除八股的主张^③。但是这些举措都没有给科举制造成严重冲击。只有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科举制度乃至中华文化才第一次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危机。

鸦片战争后,出于举办洋务的现实需要,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曾经多次提出变通科举考试乃至废除八股取士的建议,均未获批准^④。晚清政府只同意对以科举制为主干的官员录用制度进行某些枝节性的修补,如:兴办新式学堂^⑤,通过举荐吸纳洋务人才,允许同文馆等新式学堂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在科举考试中开设算学专科等等^⑥。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发生在1894年。这一年,中国陆、海军在对日战争中惨败。甲午战争的结果从精神和思想上强烈地震撼了晚清朝野,以往虽然屡屡败于西洋诸国,尚可归因于西洋器物文明的发达,但这一次,却是被向来为自己所鄙夷不屑的东洋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这不能不让人对沿袭已久的各种制度产生怀疑。而日本在短短30余年间通过维新变法由一个孱弱的东方国家一跃成为可以与西方列

① 《清圣祖实录》卷九。

②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七,《礼政四·学校》。

③ 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六,《礼政六·贡举》。

④ 李鸿章的奏折可参见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一,第3—4页;以及《李文忠公全书》之《朋僚函稿》卷十五。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十三年,洋务派官员上奏请求变更考选之制就达十五六次之多,比鸦片战争期间增加了七八倍。参见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⑤ 1862年6月,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任务的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1866年,奕訢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算学馆,培养天文、数学方面的专门人才,获得批准。继同文馆之后,洋务派创立了大批洋务学堂,包括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据统计,从1862年到1895年,洋务派创办的各类学堂达25所。同文馆的设立对科举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击,因为同文馆的学生无法通过学习科学获取声望,对他们来说,获得社会承认的道路仍然是科举,据统计,甲午之前,同文馆有13名学生在乡试以上的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杨齐福:《洋务学堂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⑥ 别必亮:《清末科举制度变革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强并肩而立的世界强国，这无疑为探索富国强兵之路的那些中国人树立了一块样板，学习日本的经验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于仿效日本鼓吹最力者莫过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维新派的诸多革新政策中，根本的一条，也是在戊戌政变后硕果仅存的一条，就是兴办新式学堂、逐步废除科举考试^①。维新派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到科举制度上，康有为宣称，“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②，“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③，“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④。他对光绪皇帝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⑤。“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威海卫）、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⑥。因此，“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⑦。梁启超也鼓吹“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⑧。“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⑨

1898年6月，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一份奏折中提出，变科举的第一个步骤是改变考试内容，废除八股文和试帖诗。不仅科举考试的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认为，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的新政中最要紧的有两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增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第148页。

③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五。

④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第218页。

⑤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68—271页。

⑥ 《康有为自编年谱》，《答载活语》。（台）《康南海遗著汇刊》第22册，第50页。

⑦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68—271页。

⑧ 《变法通议》，《梁启超选集》第13页。

⑨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26页。

内容要变革,就是科举制本身也是要不掉的,必须由新式的学校教育制度取而代之,当然,这一步骤不可操之过急,首先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办教授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等到新式学校成长壮大之后,再逐步废除科举制度,也就是“宏开学校,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的战略^①。嗣后,梁启超联合在京会试举人上书自下一科起废除八股、试帖诗,改试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科^②。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人陆续呈上了类似的奏折。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充分体现了维新派的意图,宣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用策论^③;在规定的考试之外,还开设考察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以选拔新型人才。诏书将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的第一项措施^④,同时将地方各级书院改造为新式学堂,并筹办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各种专门学堂。但是,戊戌政变后,光绪批准的所有改革措施皆被废除,科举考试悉复旧制。义和团运动——这场以“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的运动——的失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遭到广泛质疑。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行中发出了实施新政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诸事提出改革建议^⑤。科举制的兴废问题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山东巡抚袁世凯在4月份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⑥,建议增设“实学”一科,逐年核减岁科、乡试的取中名额移作实学科的名额,待到实学超过“六成”,则废掉旧科,完全培养新型的人才。两广总督陶模则直接请求废科举,他说“变法必自

①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68—271页。

② 《戊戌变法》(二),第343—347页。

③ “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5页。

⑤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601—4602页。

⑥ 《光绪政要》卷二十七;以及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上,第271—272页。

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今宜明降谕旨,立罢制艺、大卷、白折等考试,飭下直省督抚通行各属各州县,限一年内建立小学堂一区”^①。6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②,折中袁、陶观点,主张“酌改文科”,“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但是,这三份奏折均未获得批准。

1902年,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的《劝学篇》中变通科举的设想被清廷采纳: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废除八股文体,第一场考“中学经济”五道,即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第二场考“西学经济”(或称“时务策”)五道,即各国政治知识与科学技术;第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③。1903年3月,两江总督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再次奏请按年递减中额,渐行废罢科举,“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④;4月9日,袁世凯又上《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⑤,再次请求逐步废除科举制;上述建议均未获允许。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呈递《奏定学堂章程》时,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清政府终于让步,谕令“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渐递减”,三科减尽。同时,“即著各该督抚,赶紧督飭各府厅州县建设学堂,并善为劝导地方,逐渐推广”^⑥。

由于科举与学校并存,科举出身对学生仍有着强烈的诱惑力,致使一些学生不愿入学堂,学堂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

① 甘韩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通论中》。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6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④ 《光绪政要》卷二十九。

⑤ 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中册),第736—739页。

⑥ 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以及《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29、5488—5490页。

并妥筹办法折》，内有“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等语。^①同日，清廷颁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②。“并著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选师资，广开民智”^③。1904年在河南贡院举行的甲辰恩科就成了中国最后一届科举考试^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5），由隋大业二年（606）创始，为历朝历代所沿用、发展和改造的科举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废科举的制度性后果

科举制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响，除了某些国外报纸对其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之外，国内各界的反应几乎是近于悄无声息的：既少欢呼雀跃者，也乏愤愤不平者；革命派不屑一顾，改良派无意评论，保守派无可奈何；就是那些与科举制度利害攸关的士子们，也没有采取任何组织化的抗拒行动。一直在上海关注废除科举事件的日本人根津一描述说，“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也没有出头，读书人都满心欢喜”^⑤。就是在这样一片略带些兴奋的沉默气氛中，科举制度结束了它1300年的风雨历程。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考察这一措施的历史影响时，不难发现，它并不仅仅是教育文化制度与人才吸纳制度的变革，它所蕴含的变化是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其流波余韵甚至荡漾至今^⑥。

由于科举制度是连接传统国家、社会与文化的生命线，是传统的

① 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下），第1191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

④ 也有观点认为，直到1909完成最后一次优贡、拔贡考试后，科举考试才彻底废除。

⑤ 《东亚同文会史》第403页。转引自[美]任达：《新改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61页。

⑥ 对于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传统国家、社会与文化的长远影响的研究，可参见拙著：《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认同危机的深化：科举制的废除”一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权力结构、权力运行的制度性安排,科举制的废除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基于文化之上的一整套国家与社会制度,使得具有强大内在逻辑和复制功能的权力体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至少造成了如下几个历史巨变,而这些变化为理性国家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1. 儒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断裂

科举制度固然有其政治录用方面的功能,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功能,甚至不是其主要功能。王亚南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科举制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步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①。换言之,科举制实际上是一种极富成效的意识形态方式,它能成功地消弭由于种族差别和阶级分化所自然形成的分裂意识,通过建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巧妙地获得广泛的合法性支持。

儒家文化在维护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中起着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而隋唐以来,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取得与维持,是与科举制度的强力支撑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②。

萧功秦先生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一方面,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在士绅、官僚与地主这三大社会精英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这就使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普及。于是中国也就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

①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

② [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